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专门史研究

宁波近代商帮的变迁

NINGBO JINDAI SHANGBANG DE BIANQIAN

王凤山 冀春贤 等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专门史研究

宁波近代商帮的变迁

NINGBO JINDAI SHANGBANG DE BIANQIAN

王凤山 冀春贤 等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近代商帮的变迁 / 王凤山, 冀春贤等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80743-654-6

I. ①宁… II. ①王…②冀… III. ①商业史—研究—
宁波市—近代 IV. ①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6123 号

宁波近代商帮的变迁

作 者 王凤山 冀春贤等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责任编辑 曹 亮 沈建国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20 千

版次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654-6

定 价 42.00 元

引言

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在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面前,有着 7000 年河姆渡文明,受千年儒家文化熏陶,奉行“工商皆本”、“经世致用”宗旨的宁波人,奋发图强,开拓创新,西学中用,形成了宁波独特的多元文化。在这种多元文化涵养下,一大批宁波商人凭借着历史传承的经商素养和磨炼出的经商才能,顺应潮流、图谋发展,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营管理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主要城市和商埠,宁波商帮在金融、工业、商贸、航运等领域大显身手,迅速成长为近代国内杰出的商人群体。

宁波商帮如何成功实现从传统的商人群体向近代商帮的变迁?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近代中国社会为背景,以近代宁波商帮变迁为主线,以近代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领域为重点,分析宁波近代商帮的形成及曲折发展,探讨宁波近代商帮变迁的历史背景、内外因素、历史进程等。

在金融领域,近代宁波商帮拥有发达的钱庄,并对钱庄实行改革创新,及时将钱庄向银行转变。又创办近代民族银行,进军证券、保险等新兴金融业,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长期领导和掌控“上海钱业公会”、“上海银行公会”,左右着上海银钱两业,“执上海金融之牛耳”。

在工业领域,宁波近代商帮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开拓创新,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第一家机器染织厂、第一家灯泡制作厂、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等诸多中国第一,在中

国近代民族工业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航运领域,近代宁波商帮以非凡的魄力和敏锐的眼光投身于几乎被外轮垄断的我国轮船航运业,创建民族轮船公司,开拓航运业务,与外轮一争高下,遏制外国轮运势力,维护中国航运主权。其为推动民族航运业的发展,对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商贸领域,近代宁波商帮在保持传统经营项目的同时,积极经营洋货,改变进出口商品结构。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商贸区、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湾商贸区、广州厦门为中心的粤闽赣皖商贸区、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商贸区、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商贸区,凡是国内繁荣的地方,都有宁波商人涉足。他们在推动国内商贸快速发展的同时,将贸易扩展到香港、澳门、日本、东南亚、欧美各国,实现了商贸中心从内陆江河城市向沿海城市、埠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转变。

在近代金融、工商、贸易、航运领域,宁波商帮将金融与实业结合,以金融催生实业,以实业反哺金融,实现金融与工商各业的联动与共赢,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宁波商帮在成功实现旧式钱庄向近代金融转变,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变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由传统商帮到近代企业家群体的转变与升华。正因为有了这三大转变,宁波商帮才得以在鸦片战争后迅速崛起,跃居为国内其他商帮之首。

宁波近代商帮人才辈出,金融家、实业家如群星灿烂,但他们并非生来就是企业世家之后。与之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前身恰恰是名不见经传的学徒、伙计、店员。他们出身贫寒,白手起家,赤脚闯天下,最终成为业界翘楚,成功实现了自身的转变与升华,奠定了宁波商帮的人才基础及在中国近代金融业、航运业、民族工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梳理宁波近代商帮活动的历史轨迹,总结其成功的多种因素,揭示其经营理念的转变与提升等,对当代企业家的成长和发展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与启示作用。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宁波近代商帮研究综述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宁波近代商帮相关研究的历史回顾 /1
-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宁波近代商帮相关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5

第二章 变迁理论与宁波近代商帮的形成发展

- 第一节 关于变迁的相关理论 /22
- 第二节 社会变迁对近代宁波的影响 /33
- 第三节 社会变迁与宁波近代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41

第三章 宁波近代商帮在金融领域的变迁

- 第一节 宁波近代商帮的钱庄业 /47
- 第二节 宁波钱庄向近代金融业转变 /57
- 第三节 宁波商帮与近代金融业 /63
- 第四节 钱庄掌柜向金融家群体转变 /76

第四章 宁波近代商帮在航运领域中的变迁

- 第一节 宁波近代航运业概况 /80
- 第二节 宁波近代航运业的转型与作用 /87
- 第三节 宁波近代航运业的兴衰变迁 /96

第五章 宁波近代商帮在工业领域的变迁

- 第一节 手工业向近代机器生产转变 /117

- 第二节 近代民族工业中的甬商领军人物 /126
- 第三节 宁波近代商帮在民族工业中的作用 /158

第六章 宁波近代商帮在贸易领域的转变

- 第一节 宁波近代商帮国内贸易发展概况 /165
- 第二节 宁波近代商帮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187
- 第三节 宁波近代内贸向外贸转变的动因 /205

第七章 宁波近代商帮经营行业及经营理念的转变

- 第一节 传统经营业向新兴经营业转变 /209
- 第二节 宁波近代商帮经营管理思想的转变 /219
- 第三节 宁波近代商帮经营理念的特点 /227

第八章 宁波近代商帮在政治领域的变迁

- 第一节 宁波近代商帮生存的政治背景 /234
- 第二节 宁波近代商帮商政思想的嬗变 /241
- 第三节 从寻找政治依靠到丧失政治自主性 /264

第九章 从传统商帮向近代企业家群体转变

- 第一节 宁波买办群体的形成 /270
- 第二节 宁波商帮近代企业家群体的形成 /282
- 第三节 宁波近代商人成功转型的典范 /290

第十章 宁波近代商帮变迁的启示

- 第一节 宁波商帮成功的因素 /301
- 第二节 宁波近代商帮在其他方面的启示 /312

参考文献 / 318

后 记 / 323

第一章 宁波近代商帮研究综述

宁波近代商帮作为十大商帮中的后起之秀，曾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近代宁波商帮的研究成果颇多。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宁波近代商帮相关研究的历史回顾

19世纪，宁波商帮在国内尚未形成，因此很少有人关注，但在国外却引起了注意。19世纪德国地质学家、旅行家、自然科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1877年开始出版，到1912年出齐）一书中指出：“在浙江人中有一个特殊的团体——宁波人，他们在上海具有很大的势力，航运业中的船夫、水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宁波苦力充当，渐渐地取代了广东来的苦力。相对于廉价劳动力，宁波人中势力更大的是做买卖的人，特别是商业中的宁波人，简直可以和犹太人媲美。与广东商人不同，宁波商人注重的是小而零碎的利润。”

在国内，杨荫杭在《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1906）一文中，引用了《中国经济全书》（1908）对宁波帮的介绍：“上海之所谓宁波帮者，即表示在上海的宁波商人之意，如所谓湖南帮者，即表示一般湖南商人之意，其他称为某帮某帮者，皆如此也。”

从20世纪20年代起，宁波近代商帮开始引起工商界、学术界的注意，到目前为止，其研究过程大致可划分为4个阶段：

一、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1949年是第一阶段，研究资料少，比较零星分散。

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出版了《上海四明公所大事记》(1920),对上海的宁波人活动作了记述。《国闻周报》(1925年4月)“名人栏”刊登了《虞和德》一文,对虞洽卿的事迹进行评述。《钱业月报》也在1926年前后先后发表宁波帮代表人物秦润卿的《上海之钱庄事业》、《远期庄票考》等文章,对组合钱庄的手续、远期庄票等内容作了阐发。徐寄廌的《最近上海金融史》(1926)出版,通过对上海金融业的回顾,介绍了不少宁波工商人士的情况。张传保、赵家荪修,陈训正、马瀛纂的《鄞县通志》(创修于1933年,1951年4月最终印竣)指出:“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宁波商人足迹已遍布大江南北,跻身全国著名商帮之列,并且已经扬名海外。民国时期则是宁波商帮的鼎盛期,此时新一代商业资本家已经形成,势力居全国商业、金融业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国外研究宁波工商人士的论著也相继出世。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在他的《中国的社会现状》(1926)中考察了中国各地的航运业后说,无论是长江航运还是沿海航运,轮船上上至买办、驾驶员,下至伙夫、水手,几乎全是说着宁波话的宁波人。可见,在当时中国海运业完全由宁波人支撑着。在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海上名人传》(1930)中,被列为“海上名人”的100人,有19位是宁波人,这些都是在上海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宁波商帮人士。中国征信所编的《中国工商人名录》(1936)也录有在沪的宁波工商人士,在1836个工商人士中,宁波籍的工商人士有453人,占四分之一。

二、从1949年至1978年是第二个阶段,本段国内对宁波商帮的研究是曲折的。

本段研究主要以出版资料为主,有些打上了“左”的时代印记。科学出版社于上世纪50年代晚期,出版了孙毓棠、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1957);彭泽益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957);陈真、姚洛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4辑(1957);姚贤镐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1962)。出版的这些史料介绍了不少宁波帮所经营的企业,如三友实业社、中国化学工业社、民丰造纸厂、信谊化学制药厂、大达轮船公司等。还有不少文史资料提到宁波近代工商人士,比如,《上海文史资料》第16辑《五洲固本肥皂与祥茂肥皂的竞销经过》(1964),对项松茂的民族制药业发展作了描述。许念晖在《全国文史资料》第15辑中发表的《虞洽卿一生》(1961),认为虞洽卿是“典型的买办阶级”,遗臭万年等。赵晋卿在《全国文史资料选》第

31辑(1962)发表文章,对《虞洽卿一生》一文中作了几处补正,为虞洽卿洗脱了一些罪名,说他也做了一些好事。从1949年至1978年期间,由于政治因素对宁波商帮的研究一直被冷落,并且是批判讨伐多于褒奖。

在本段时间内,国外对宁波商帮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出自日本学者。根岸佶《中国的行会》(1953)一书认为,宁波帮是乡党观念异常强烈的乡帮,它把局部的乡谊联系到同省毗邻的地区以至整个浙江省,扩大其在上海的范围,形成“大宁波帮”。同时,对上海的四明公所、四明医院等宁波商人为同乡解决就医、就学问题作了介绍。根岸佶的《中国社会的领导层》和《买办制度研究》,对宁波帮旅沪的镇海人方介堂及奉化人朱志尧等的家族作了介绍。西里喜行在《东洋史研究》上发表了《清末的宁波商人》(1967.9),认为上海的钱庄业主要是宁波帮和绍兴帮,而宁波帮钱庄的实力又超过绍兴帮,宁波商人成为上海外商银行、洋行主要的“买办后备军”。

美国学者苏珊·曼写了《宁波的金融:“钱庄”,1750—1880年》(1976),登载在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上,认为宁波商人是钱庄信用制度的开创者。不久又发表了《宁波帮和上海的金融势力》。香港学者钟树元的《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1948),在对江浙财团的分析中也认为宁波帮是“江浙财团的支柱”。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宁波帮借助各种因素,促成江浙财团与南京政府的结合,使之成为江浙财团的主角,甚至成为江浙财团的皇亲国戚新贵族。

三、1979年到20世纪末是对宁波商帮研究的第三阶段,本段对宁波商帮的研究热潮逐渐兴起并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本阶段在邓小平“动员宁波帮建设宁波”指示的鼓舞下,宁波商帮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线,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上海文史资料》第29辑中吴培初的《旧上海外商银行》(1980),对宁波籍的金融人士作了介绍;黄逸峰等人的《旧中国买办阶级》(1982),对近代宁波买办等人作了评述;丁日初、杜恂诚两位合撰的《虞洽卿简论》(1981),对虞洽卿的一生析疑辨难,匡谬订讹,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日本学者中村哲夫的《移情阁遗闻——孙中山与吴锦堂》(1990)一书认为,1905年上海的宁波商人的金融实力超过了同清政府关系密切的山西帮,从而确立了他们在上海金融界的霸主地位。香港中文大学梁元生的《19世纪中叶上海商界地区性集团之间的竞争》(1984.1),从对外贸易、职业分布和政治势力等方面对宁波工商人士在上海的势力进

行了较详细的分析。

四、进入 21 世纪,对宁波商帮的研究进入第四阶段,本段研究论文明显增多,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性专著及人物传记陆续出版。

如李璩的《上海的宁波人》(2010.10),丁言伟等《百年商旅——宁波帮》、张守广的《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陆平一主编的《创业上海滩》、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群星灿烂——现当代宁波籍名人》,以及贺建时、曹屯裕主编的《宁波帮与宁波大学》等。另外,还出版了一些研究“宁波帮”的其他著作,出版了王耀成的《一个香港老人的希望之路》(2002),记述了赵安中充满希望和奋斗的人生历程。陶水木的《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2003.3),书中不少内容涉及“宁波帮”。吴潮的《浙江籍海外人士研究》(2003.8),专门研究了“宁波帮”问题。鲁波、许琰的《同仁堂:金字招牌的魅力》(2002.1)和杨国萱的《达仁堂的故事》(2004.5),介绍了宁波人乐氏家族所创办的同仁堂、达仁堂的历史和经营理念。

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发表 20 周年,对“宁波帮”的研究又掀起一个高潮。仅 2004 年就有专著和编著 10 余部问世。主要有乐承耀等所撰的《宁波帮经营理念研究》,马卫光等的《百年宁波帮》(2004.7),陆平一主编的《战斗在大上海》(2004.7),陈守义主编的《宁波帮研究》(2004.12),和王满国的《天下宁波人》等。除此之外还出版了一些传记,如曾宏燕的《上海巨商黄楚九》(2004.5),孙善根的《走出象牙塔——蒋梦麟传》(2004.7)、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大笔淋漓——潘天寿传》(2005.1)等。

除了专著之外,本段研究性的论文超过百余篇,几乎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论文总和相等。如孙善根、李建平的《近代宁波的民食问题及其应对——以 1920 年代为例》(2005.5),郭剑波、赵红峰的《近代宁波港衰弱的原因分析及启示》(2005.2),周春英的《近代宁波帮的经营管理思想与实践》(2004.3),孙善根的《近代宁波外滩与宁波的近代化》(2004.1),张真柱、单佳平的《儒家学说与近代宁波帮经营管理思想》(2002.2),单佳平、张真柱的《略论近代宁波帮经营管理的成功之举》(2001.1),王列辉的《近代宁波港腹地的变迁》(2008.1),沈月红、孙善根的《宁波商人对近代宁波慈善事业的贡献》(2007.1),李建平、李小红的《近代宁波帮实业家李善祥的传奇人生》(2006.4),肖阿伍的《虞洽卿经济活动研究》(2005.3)。

还有王苏英的《近代宁波钱庄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经营特色》(2006.3),乐承耀的《近代宁波商人的和谐思想》(2007.1)、《近代宁波商人与慈善机构》(2007.1)、《近代宁波商人与上海经济发展》(2006.4)、《在杭州的近代宁波商人》(2005.6)等。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宁波近代商帮相关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国内外关于宁波近代商帮相关研究的现状

(一)关于宁波商帮形成及影响的研究

林树建在《宁波商帮的形成及其特色》(2008.11)中认为,宁波帮的形成是以北京鄞州会馆和浙慈会馆的设立为标志的。当时宁波商帮正处于初始形成阶段,会馆起到了组织同乡联谊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了其他不可忽视的作用,同乡组织凝聚起来的社会群众网络和力量,对于一些有商业意识的宁波商人来说是增加财富并巩固自身地位的有效工具。葛国培在《“宁波帮”的形成初探》(1990.2)中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宁波商人在上海立足,在沪的宁波人建了殡馆、祠堂和墓地,称做四明公所。宁波帮的萌芽就是以上海四明公所的成立为标志。清乾隆、嘉庆年间是宁波商帮的迅速发展时期,商帮势力在北京得到稳固加强后,还延伸到了常熟、汉口、上海等商业繁荣重地。鸦片战争之后,宁波商帮日趋成熟。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的《宁波帮研究》(2004.10)中认为宁波帮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上众多地域商帮中的主要商帮之一。明清以来的地域商帮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内地商帮和沿海商帮。内地商帮主要以徽商、晋商为最大;沿海商帮则以海商为主,其中以粤帮、闽帮及浙江宁波帮为最大。

(二)关于宁波近代商帮经营主要领域的研究

张守广在《明清时期宁波商人集团的产生和发展》(1991.3)中指出,宁波商人既有大量的行商即贩运商,又有众多居肆贸易的坐商即铺户,而最多的却是行商坐贾兼于一身的商人。这些商人不但活动范围大,经营内容也很广泛,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船运业的经营。这个行业是宁波商人主要的也是最擅长经营的行业之一。二是民信业的经营。民信局又称信

局或民局,是一种以承递银信包裹为主的民间邮递机构。三是钱庄的经营。宁波商人最早经营的钱庄是北京的“四恒号”。宁波本地钱庄的兴起,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早的。四是其他商品的经营。例如鱼盐海产、南北货、药材、绸布、木材、粮食等都是宁波商人重要的经营内容。另外,席、草帽等也曾是宁波商人经营的商品。

鲍杰、包鹤年、孙善根编的《论近代宁波帮》(1996.4)中指出,明清时期宁波商人的经营内容主要包括:航运业、民信业、钱庄、其他商品贸易等,涉及面非常广。除此之外,他们还对当时宁波帮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一是主要以中小商人为主,富有生命力,和当时的官府没有密切的关系。二是与同乡之间团结互助,共同创业。三是宁波商人拥有的船商资本具有产业资本的性质。四是注重诚信,管理方式多样。

曹峻、郭绪印在《近代上海宁波帮的经济与组织》(1995.4)中提到,民国时期,特别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步入短暂的春天,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的有宁波、上海等地。在上海的宁波帮势力强大,投资领域涉及当时上海的所有工商业,在航运业方面,更是以宁波帮经营的宁绍与三北公司为最强大。宁波帮势力还遍布饮食、服装、建筑、燃料、五金等上海主要的商业行业。在金融业方面,除了宁波帮一直保有绝对优势的钱庄业外,在新兴的银行业中宁波帮也独占鳌头。当时的宁波帮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中国大部分重要的银行。

孙善根在《宁波帮与宁波的早期现代化》(2005.6)一文中提到,19世纪60年代后,在上海洋布业、颜料业、五金业、新药业等新式商业中独领风骚的宁波商人纷纷在宁波投资新式商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宁波在工业发展上也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这时期又有虞洽卿等著名宁波帮人士加入投资行列,行业涉及棉纺织、玻璃、织席、五金、罐头、食品、电力、机器修理、卷烟、日用工业品等。

陈守义在《鄞县籍宁波帮人士》(2006.1)一书中提出,相对于镇海、慈溪商人在航运业、钱庄业的影响,旅沪鄞县人则更多涉足进出口贸易、新式商业和机器制造业。机器制造业一直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软肋,自19世纪80年代起,鄞县商人频频问鼎这一行业。在近代上海的进出口行业中,金属、染料、棉布、棉纱、砂糖、机械、杂货等输入品的经营,数十年来为宁波人绝对独占。

(三)关于宁波近代商帮活动地域的研究

陈春舫在《宁波帮在上海的崛起》(2005.1)中提到在鸦片战争前,宁波与上海由于同处杭州湾口,一直以来就来往甚密。宁波地少人多,但是物产很丰富,很多甬商往返沪甬之间从事商业、贩运。1842年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的商埠之一,大量宁波人涌入上海,在上海经营起各行各业。到1930年,宁波人在上海的总人口中占到五分之一。

乐承耀(2005.2)在《近代宁波商人与上海经济发展》一文中论述道:富有经商传统的宁波商人,深刻认识到上海崛起的地位和作用,抓住开埠的机遇,抢滩大上海,涉足近代上海经济各个领域。先在沙船业,后在金融、商贸、工业、交通、医药、房地产等各个经济领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在商贸、航运、金融业更是独占鳌头。

徐凯希在《宁波帮与湖北近代工商业》(2004.6)中指出,在汉口的宁波帮借助武汉的区位优势及其本身的商业头脑,在汉口渐渐站稳脚跟,活跃在各个领域。当时宁波帮分布于很多地方,但主要还是上海、天津以及汉口,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同乡组织,团结同乡一起经营商业,使其能在当地更稳固地发展。

徐祖光在《北京宁波帮发展历程及历史作用》(2006.8)中论述了在北京的宁波帮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兴起、鼎盛、衰落和振兴四个发展阶段。北京的宁波帮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陈守义的《宁波商帮在天津》(2006.1),介绍了宁波商帮北上津门、扎根天津、开拓发展天津近代金融业、实业、社会文化,组建同乡组织、开展慈善实业等活动,认为宁波商帮为天津的近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关于近代社会变迁对宁波近代商帮影响的研究

1. 关于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

王业兴在《论中国经济近代化滞缓的原因》(2001.2)中指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机遇的丧失。能否适合潮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己,是一个民族和整个社会能否取得进步的关键。鸦片战争前后约五六十年时间,即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当时,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先后实现了社会的转型,工业革命的完成和新型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飞速发展。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当时若能认清世界发展的形势,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抓住时机,就有

可能跨入世界近代化国家的行列。二是官僚政治制度的障碍。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特权政治阻碍了中国的经济近代化，从而影响了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三是经济运行机制的缺陷。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势力的夹缝中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它的脆弱和畸形，加之运行机制的缺陷，阻碍了近代化发展进程。四是人的素质不相适应。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中国人的状况与近代化很不相适应，这是导致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五是国家核心领导层的无力与无能。

2. 社会变迁对宁波近代商帮影响的研究

李斌的《上海的宁波人》(2000.10)，比较系统地考察了1843年至1937年间宁波人在上海的经营活动，揭示了旅居上海的宁波人的迁沪动因、社会构成、心态结构及其参与上海和融入上海的情况。张敏杰在《论“宁波帮”》(1987.12)中认为，宁波是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最早的城市之一，五口通商后外国资本主义由此向内地延伸势力，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半殖民地化程度越来越深，阶级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

乐承耀在《近代宁波商人与社会经济》(2003.8)中，分析了近代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分工，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反帝爱国主义，辛亥革命等社会运动对宁波商帮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沈月红在《论近代宁波的对外贸易及影响》(2007.1)一文中指出，近代宁波对外贸易促进了宁波近代化，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其积极作用还是有的。作者认为近代宁波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宁波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促进宁波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加速宁波近代商业的产生和发展；改善交通邮电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区域社会的影响表现在：宁波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买办；改变了宁波地区的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新的“市民”群体的形成。

林树建、林旻的《宁波商帮》(2007.6)一书中，分析了宁波商帮崛起的人文环境：滨海地区海洋文化、通商诸国外来文化。介绍了宁波商帮嬗变的历史轨迹。然后，从银楼业、药材业等传统行业，沙船贩运业、钱庄业、银行业等支柱行业，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业等顺应时尚的新兴行业等方面讲述了宁

波商帮经营的主要行业的变化。最后总结了宁波商帮群体的人文特质。

陈国庆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2005.12)中指出了近代宁波商人抓住对外开放的机会,纷纷涉足对外贸易、百货零售等新的商业领域。因此,随着口岸通商,外商的涌入,向洋人学习先进的管理技术、经营策略等都给宁波商贸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考。宁波商人创造了洋泾浜英语,做外商代理人,学习商贸知识。他们在与洋人打交道时也深知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开创性地创办了各种学堂。宁波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开埠后宁波商人顺应时代与市场需求,而不断壮大起来。

(五)关于宁波近代商贸科技的研究

顾红亮、徐怡编著的《双峰并峙的浙商》(1997.3),详细地介绍了明朝的海禁政策与宁波人的反海禁、宁波私人海上贸易的特征、海上贸易和内地贸易的内容及称雄上海滩的宁波买办。

陈梅龙在《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2003.6)一书中,主要概括了杭州、宁波、温州从1882年至1931年间的对外贸易和社会变迁的基本状况。其中,宁波海关税务司杜德维(E.B.Drew)在1879年宁波海关贸易报告中指出,宁波与内地贸易的主要商品是原色布、原色扣布、糖、铁、毛织品和铅、丝绸等。在众多杂货中,煤油的进口量不断增加。运往内地的淡菜、胡椒、藤条和檀木在这一年都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乐承耀在《19世纪中晚期宁波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原因》(1998.5)一文中指出,19世纪中晚期,宁波对外贸易的殖民地化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西方列强对宁波倾销其工业消费品和掠夺原料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等价交换;第二,外商控制了宁波对外贸易。乐承耀还在《近代宁波商人与社会经济》(2007.8)一书中指出,武汉与宁波两地贸易频繁,宁波的药材、水产品、棉花、棉纱等产品经过宁波商人贩运到武汉。同时,把武汉的杂粮、桐油等运回宁波。清末至民国,甬汉两地的贸易仍然在进行。两地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宁波对全国各埠贸易额的第二位,仅次于上海。

竺菊英在《开埠前宁波对外贸易历史地位探析》(1995.3)中指出,宁波在唐宋时期海外贸易便已十分繁荣,特别是与日本、高丽等国通商频繁,当时输出的多为浙江产的瓷器和丝绸。竺菊英还在《近代宁波对外贸易衰落原因探析》(1996.2)一文中,提出了宁波对外贸易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有:(1)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和鸦片贸易;(2)上海对外贸易的崛起;(3)杭州、温

州等地的相继开埠。

谢俊美在《西方开埠宁波的历史回顾和宁波帮的形成》(2005.1)中提到,西方人对宁波的关注由来已久,十分看重宁波的贸易优势,并为宁波的开埠作了几个世纪的努力。宁波正式开埠后,并没有形成英美资产阶级想象中的通商口岸,贸易量反而日渐萎缩,之后贸易重心转向了上海,宁波则充当了辅助的角色,其主要原因有:上海的地理条件更加优越;海盗和走私活动严重,影响了宁波的正常贸易;受太平天国的影响,宁波“商旅裹足不前”。

徐定宝在《论宁波商帮对科技进步的历史贡献及现实影响》(2004.6)中指出宁波商帮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别是在改变传统观念与树立科技发展的新思想方面。同时,他们在打造民族工商业上也有过作为,除了传统的经营,还在兴办科技型工业上作出过重要贡献。

(六)关于宁波近代航运方面的研究

何文贤在《与狼共舞》(2005.9, 博士论文)中提到,夹缝中求生存是中国民族轮船航运业的命运。西方资本主义的洋枪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凭借着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开放中国沿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宁波就是其中之一,宁波的航运由此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陶水木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2000.3)一书中,重点介绍了虞洽卿与三北航运集团。虞洽卿先后创办了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埠公司、宁兴轮船公司、鸿安轮船公司,形成了实力仅次于官营招商局的三北航运集团。1913年,虞洽卿为便利家乡棉花等产物的输出,购置镇北号小轮船航行于龙山、镇海、宁波、舟山间,促进了国内贸易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垄断中国航运业的英资轮船公司船只被征回国,德、奥在华航业公司则随着中国参战退出中国市场,而此间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这种状况为中国民族航运业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虞洽卿正是抓住了这一契机,积极扩展航运事业。此后,三北公司的注册航线已经包括南北洋各主要航线。除了扩展沿海航线外,虞洽卿又打入了长江航线,将长江沿岸的各内陆地区联系了起来。沿海航线及内陆航线的开辟,紧密联系了中国东西南地区,促进了中国各地的贸易往来,促进了中国近代贸易的发展。

乐承耀在《宁波人贯穿古今的精神品格》(2005.4)中指出,宁波人做事是